

東北抗日斗争史論丛

会科学院

论中共中央“北方会议”和 “一·二六”指示信对 东北抗日斗争的影响

李 鸿 文

一、“九一八”事变后历史的基本要求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预谋已久所发动的突然袭击，由于东北军队执行了蒋介石国民党南京政府的不抵抗命令，日本侵略军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以后，即迅速地侵占了东北铁路沿线的许多战略要地和重要城镇。

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的侵略罪行，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潮流，尤其是身受其害的东北各阶层人民更是义愤填膺，同仇敌忾，立即自发地掀起了武装反抗侵略的斗争。东北军民的抗日战火迅速漫延至全东北各地，一场新的挽救民族于危亡的群众性的反侵略战争开始了。

中国共产党站在东北民众抗日斗争的最前列。“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它立即向全国和东北广大人民发出多次抗日的宣言和号召。事变后的第二天，九月十九日，中共满洲省委召开紧急会议，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九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

省事件宣言》。随之，中共满洲省委和中央在九月二十一日与二十二日相继作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据满洲与目前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案》和《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在这些抗日号召中，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掠夺中国，压迫中国工农革命，使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的侵略罪行，揭露了国民党南京政府不抵抗的可耻行径，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和东北同胞誓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将侵略者驱逐出中国的决心。

中共中央与满洲省委为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在军事工作、士兵工作方面也有多次指示。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三日，满洲省委在《关于士兵工作紧急决议》中向各级党组织提出，要求在军队士兵中发动“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缴械”，反对长官执行不抵抗命令的斗争，以至哗变出来。认为“如果有占领当地反抗日军进攻的力量，必须利用这一机会领导他们，并且发动与工农群众的斗争配合，反抗日军的进攻”，否则哗变“到农村去（最好到有工作的地方）帮助与发动农民的斗争”，“进行游击战争”，“扩大与改编原来的队伍。”一九三一年十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满洲士兵工作的指示》中指示：“满洲的形势是极有利于游击战争的开展”，

“在开始发动游击战争的时候，要找出群众斗争比较活跃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地方，游击队做群众武装斗争的前锋，群众做游击队的基础，游击队与群众配合起来才能开展游击区域与加强扩大游击队。”为开展士兵工作，中央要求“立即由省委派巡视员或帮助地方党部将旧的基础整顿起来”，“挑选与训练新的干部打入白军中去当兵来创造新的基础。”中央与满洲省委共同要求一些重要地区的党的组织要建立兵

委，以便开展士兵工作和发动游击战争。根据中央和满洲省委的指示东北各地党的组织陆续派出一些优秀干部、工人、学生到某些军队中去，到蜂拥而起的各地抗日义勇军中去，到农村中去，开展军运工作和组织抗日游击战争。

中国共产党及时发出的抗日号召和必要的组织工作，对于东北抗日战争这一伟大斗争的开展，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在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的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面前，在党的抗日号召与影响之下，中国各个阶级的政治态度开始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在日本侵略军队铁蹄践踏之下的东北各阶层群众，除极少数民族败类投敌卖国之外，广大的工人、农民、学生、工商业者，以及许多爱国将领、爱国人士均积极要求抗日救国，反日浪潮迅速遍及东北各地。

各地学生首先以罢课、示威游行来反抗侵略者，许多人脱下学生装，投笔从戎，与抗日士兵一起直接对日作战。城市工人则以罢工、怠工的行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日本帝国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满洲罢工斗争是前所未有的”。广大农村的农民纷纷夺取武器，组织大刀会、红枪会，抓走狗，审叛徒，回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

在广大群众和爱国士兵的反日行动的推动下，东北旧统治营垒和尚未撤入关内的军队发生了分化。马占山率领黑龙江省军队在嫩江桥抗击日军侵略的行动，振奋了各地旧东北军中爱国将领的抗日热忱。李杜、丁超、冯占海、邢占清、张作舟、赵毅、张振邦等吉林军队组成吉林自卫军，在哈尔滨与哈东各县多次和日本侵略军发生激战，给予侵略军以相

当打击。苏炳文、张殿九等分别在中东路西段呼海路 and 海伦的抗战，阻挡了日本侵略军在北满的迅速推进。这种敢于违背国民党统治者的不抵抗旨意，自发汇集十数旅军队大规模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行动，在中国近代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它揭开了东北群众性抗日战争的序幕，成为东北各阶层人民武装抗日的开端。

与此同时，在东北军警中的一些下级军官，如王德林、吴义成、唐聚五、王凤阁、邓铁梅、李海青、耿继周等揭竿而起，民众响应，在东满、北满与南满各地建立起数量众多的抗日义勇军，顽强杀敌，屡建奇功。这些群众性自发的抗日武装斗争，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人民群众不顾统治阶级的阻挠，自发地起来直接反抗外国侵略者的行动的又一重要体现。它构成了当时东北群众性抗日武装斗争这幅波澜壮阔画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九三二年，是东北各地武装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民族自卫战争，如火如荼的向前发展的一年。它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迟滞了日本欲变中国为它殖民地的进程。

东北各地的抗日战火，实际上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开端，并且是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抗日战争的主要体现。

东北各地的抗日斗争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课题，即必须从这一群众性抗日斗争的现实出发，迅速制定出能够团结全东北以至全国各阶级各阶层抗日群众的总的方针与策略，才能担负起领导抗日民族革命战争这一新的伟大的历史任务。

二、中共中央“北方会议”和满洲省委扩大会议在 东北抗日斗争中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危害

“九一八”事变发生，正值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中共中央全面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政策的时期。这时刚成立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虽然也曾经及时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和蒋介石南京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号召全党“同下层小资产阶级群众，如象一部分革命学生，小商人，以至城市贫民成立反帝的统一战线”^①，发动和领导群众开展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武装斗争。但是，由于临时中央政治局继续在全国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政策，对于当时国际国内的局势作了不正确的判断。它片面地强调了“两个世界的对立”，夸大了日本和其它帝国主义“一致的进攻苏联”的可能性，认为“九一八”事变“将成为世界大战尤其是反苏联战争的导火线”；又片面地强调了国内“两个政权的对立”，夸大了由于南方红军粉碎国民党第三次反革命“围剿”的胜利，已使国民党“反革命统治日益崩溃”，“全中国的革命危机，日益成熟”的局势，认为“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的斗争。”因此，确定党的主要任务是武装保卫苏联与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从而忽视了“九一八”以后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和全国各阶级的抗日民主要求，未能首先着重指

① 《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反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1931年9月20日）。《六大以来》（上）第149页。

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化整个中国这一主要危险。未能提出动员广大群众同日本帝国主义这一主要敌人进行斗争并收复失地的主要任务，因而势必对于当时国内风起云涌的抗日民主运动和部分地区已经开展的抗日民族战争，不能给予正确的和有效的领导。

临时中央政治局为了推进它的“左”倾冒险主义，夺取几个中心城市，实现“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竟无视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不平衡性的特点，不但要求南方农村根据地“立刻扩大与巩固红军”，“要扩大苏区至中心城市”，而且要求在国民党统治的城市和区域举行总同盟罢工，普遍武装工农，“以响应与配合红军的行动，来争取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

临时中央政治局的这种由于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所导致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推行过程中，势必处处碰壁，遇到阻力。于是在党内又发展了过火的斗争，要求开展所谓“两条战线”的斗争，特别打击“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向各地区派出“中央的组织或中央代表”，“改造”各级党的组织，强行贯彻“左”倾错误政策。一九三二年六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集的“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就是在北方各省强行推行这一错误政策所采取的严重步骤。

北方会议在六月下旬召开于上海法租界，会期七天，参加者有河北、河南、陕西、山东的省委书记，满洲省委由组织部长何成湘参加，此外中共临时政治局博古、张闻天和组织局长李竹生（后叛）、组织部长康生，以及曾巡视过北方各省的中央组织局巡视员魏抱一等参加。

会议通过了《革命危机的增长与北方党的任务》、《关

于北方各省职工运动中几个主要任务的决议》、《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苏区的决议》，并由博古作了会议的总结。

会议中，各省汇报了本地的工作情况，何成湘在会上谈到已经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成为它独霸的殖民地的满洲的特殊情况，他认为会议在确定党在东北的任务时应不同于关内，不同于南方苏区。有的省（例如陕西）也谈及北方革命形势落后于南方革命根据地的事情。但是，这些对北方客观形势的如实反映，在会上和会议最后所通过的决议以及博古所作的总结报告中，则被当做“北方特殊论”和“北方例外论”而予以“无情”的批判。北方会议集中火力反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北方“落后论”、“特殊论”，“会议最坚决的指斥北方‘特殊论’与北方‘例外论’，这是没有根据的机会主义的胡说，实质上是企图否认革命危机在北方的存在。”^①

实际上，第一，东北已经不同于关内，它已经从过去与全国一致的几个帝国主义所间接统治的半殖民地地位，完全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独占的殖民地。其它帝国主义的干预已经不起多大作用，军阀内部之间的矛盾再也酿不成过去那种大规模的和连绵不断的军阀混战了。伪“满洲国”是日本帝国主义一手炮制的傀儡政权。日本的殖民统治威胁着东北几乎所有各个阶级的命运，即不但损害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基本利益，而且也危害了地主和资产阶级的财产、权益。因此，除了极少数的汉奸之外，抗日反满是东北人民的共同

^① 《革命危机的增长与北方党的任务》。《六大以来》（上）第256页。

要求。第二、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和军事统治，已经迫使东北人民毫无选择余地的较为普遍地拿起武器，组织队伍，进行武装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九一八”事变后，除了共产党组织的农民抗日游击队外，尚留在各地的东北军队余部中许多都改编为抗日自卫军、义勇军，抗击日军侵略，甚至土匪也同情抗日队伍，参与对日伪军作战。第三，东北各省人民没有经过第一次大革命的洗礼，群众的政治水平与组织程度不高，共产党、共青团以及革命群众组织成员的数量远不如南方各地；蒋介石国民党的影响并不大。等等。因此，在这种阶级矛盾下降，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并且在一定的意义上说，已经是全民自发武装抗日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作为抗日战争的领导者与组织者，在东北，只能提出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人民，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而不能采取普遍地毫无区别地在城市实行罢工、在农村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北方苏维埃”的政策；只能提出与一切抗日武装力量联合起来，订立抗日作战协定，或采取其它适宜的步骤共同对日作战的政策，而不能采取自相火併，或者在抗日友军中实行“譁变”，另组红军的政策；只能提出中华民族自卫的抗日战争口号，而不应提出“武装保卫苏联”与过分地“反对国民党”的号召。否则势必超越群众的认识水平与组织程度，势必脱离人民群众，脱离实际，而陷于“左”倾冒险主义泥坑。

但是，在“左”倾冒险主义者统治之下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却一意孤行，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高压之下，北方会议将“武装保卫苏联”，“建立红军”，“建立北方苏维埃”，作为北方各省党的主要任务列入会议的决议。决议中

武断地认为：“我们不仅在南方，同样的也在北方，只要在坚定的阶级路线与正确的群众工作之下，游击队能迅速的成长为红军，只要毫不延缓地开展群众日常斗争，深入土地革命，发动广大劳苦民众为自己政权而斗争，游击区域是能够巩固的奠定新苏区的基础”；会议决议指出中间力量是“革命最危险的敌人”，要予以“无情的揭露”。还指出：“我们只有以布尔塞维克的坚定性，百折不挠性，经过不断的斗争，残酷战胜一切的困难，克服一切机会主义的动摇，方能顺利的实现新苏区的创造。”

不言而喻，这种对于北方党的任务的规定，完全是教条主义者从“两个世界对立”、“两个政权对立”的刻板公式出发，不顾中国客观实际的主观主义的产物，结果势必犯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的错误，给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事业带来严重的危害。

北方会议后，出席会议的满洲省委代表何成湘返回东北，曾经相继召开满洲省委会议和哈尔滨市委的会议，传达这次会议决议。不久，临时中央政治局派遣魏抱一到东北，满洲省委立即又于同年七月十二日在哈尔滨南岗召集了省委扩大会议。出席人：魏抱一、罗登贤、何成湘、詹大全、金伯阳、张贯一（杨靖宇）、冯仲云等十四人。会期一天，通过了《满洲省委扩大会议告同志书》和新省委组成名单。由魏抱一、何成湘、金伯阳三人组成省委常委，魏抱一代理省委书记。会后，又连续召开三次新省委常委会议，通过了《满洲省委扩大会议决议》（7月12日）、《满委武装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决议》（7月24日），接受中央“北方会议”的决议。

这次省委扩大会议和常委会议，集中地批判了前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的所谓“满洲特殊论”、“满洲落后论”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然而，根据现在保存的《满洲省委扩大会议记录》和满洲省委给中央抄录的中央巡视员关于满洲省委常委第三次会议的记录，以及《仲云巡视满洲致中央的报告》（同年7月15日）等文件重新研究，罗登贤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二年七月主持满洲省委工作时期，虽然有若干缺点与错误（例如对于各地的由前东北军将领领导的许多抗日义勇军，由于一时识别不清而进行的工作不多等），但在党领导东北抗日斗争工作的许多方面还是有成绩的，并且执行政策许多也是正确的。罗登贤被迫在满洲省委扩大会议上代表省委所做的工作检查中说：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满洲党组织提出“反日而不反对豪绅地主”，“不揭发国民党的欺骗”，“几个月来省委没有领导一次罢工”，“兵变运动的放弃”，在磐石，巴彦不注意去执行党的土地革命这一“基本任务”。在《仲云巡视满洲致中央的报告》中说：省委扩大会议揭发，“从两个世界的对立的认识发动广大的劳苦群众拥护苏联的中心任务，省委过去的认识不足，没有看成为中心任务，而只把它当成为次要的工作，所以结果不但决定许多拥护苏联的工作没有执行，甚至有些地方党部和个别的同志谈都不谈。”“其次，对于中国现在两个政权对立的形势及执行中央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任务决议之下，建立满洲的苏维埃政权问题，也不能在满洲很实际来领导执行，而只看成为宣传及仅仅是南方的问题；对满洲现在的‘独立’政府及国民党政权的估计，也以为是国民党现已经死亡或就要死亡，……以致发生忽视或停止反国民党反

革命的斗争，许多地方党部都走到和国民党联合”，“到反日军中工作的同志……走到和国民党合作，联合国民党长官的道路上去。”“对土地革命斗争如何更普遍的使（之）在反日战争（中）来实行……以前省委是不认识的。如此次杨林同志^①在磐石，便根本怀疑这个口号，以为实行起来，会分裂中韩被压迫民族的联合战线……在巴彦此次同志所领导的游击队也反对没收地主的家产粮食。”等等。

从上述历史文献中不难看出，罗登贤同志虽然是在四中全会之后由“左”倾冒险主义者统治中央时期被派来东北巡视工作，后来并且由于满洲省委的突然遭到破坏而担任了满洲省委书记的职务，不过在他主持省委的这段时期工作中并未随波逐流，而是根据“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东北后的东北政治局势的重大变化，比较慎重地实事求是地采取了正确的政策与策略，因而使得东北党的组织在这一时期的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且推动了东北各地抗日斗争的迅速发展。

可是，罗登贤却遭到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临时中央的“无情打击”，被批判，被调离满洲省委书记工作岗位。

这次满洲省委扩大会议与新的省委常委会议在所通过的《满洲省委扩大会议决议》中，将“独立领导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作为党的中心任务之一，指出“须建立党的独立领导的中心部队，来独立的发动与领导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对

① 杨林（原名金勋，亦名毕士第）（1901年—1936年），当时任中共满洲省委兵委负责人，被省委派到磐石领导当地的农民抗日武装起义，并组织抗日游击队工作。

于一切不在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进行反日战争的“几个最主要的中心队伍，各地党部必须有计划的参加这一队伍，并争取（对）他们的领导。”

但是，上述《决议》中又规定：“拥护苏联是目前第一等的任务。”在七月二十四日《决议》中又说“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决不是宣传口号”，而是“一切实际工作行动中心”。同时认为“独立领导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这一任务必须与执行土地革命的任务密切联系起来，汇合起来，来开辟满洲的新苏区。”为实现这一中心任务，在具体工作中又确定：城市中工人普遍举行罢工与游行示威；农村中贫苦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军队中普遍实行转变，建立红军游击队等等。结果，不但使党脱离了群众，而且严重地削弱了党的对于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作用，十分不利于团结各抗日阶级、党派、军队的共同抗日事业，使得党的组织和刚刚组织起来的某些红军游击队，不但不能“独立领导反日的民族战争”，反而使自己的处境十分孤立。

事实恰恰如此：

中共满洲省委从一九三二年七月中旬在东北贯彻“北方会议”决议，到一九三三年五月接受中央《“一·二六”指示信》的期间，党在东北领导抗日斗争事业有一定的进展和成绩。其中，较为明显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下除较早建立的磐石游击队、安图游击队、绥宁游击队以外，又新建了海龙游击队（一九三二年八月），东满各地在原有零星游击武装基础上，一九三二年冬正式成立了延吉游击大队（九月）、琿春游击大队（九月）、汪清游击大队（十一月）、和龙游击大队（十一月）。在南满磐石、海龙和东满延吉、汪清、琿春、

和龙等地，已形成了一些小块的抗日游击区和游击根据地，建立了一些农村革命政权和群众组织——反日会等。

同时，党组织派遣的许多干部、工人、学生参加到各地抗日救国军和义勇军去工作，亦都著有成效。其中，赵尚志在巴彦东北抗日义勇军（亦称巴彦游击队）任参谋长。周保中在东北地区抗日联合军司令部任参谋长。李延祿原在救国军任参谋长，一九三三年一月成立救国游击军时，又担任司令职务。李兆麟在辽阳的义勇军中也进行了许多的工作。他们对于团结其他抗日部队共同进行抗日的工作作出了贡献，并为后来党直接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第五军奠定了基础。

但是，同一时期，由于“北方会议”的“左”倾冒险主义政策的贯彻，给予党在东北各地领导抗日斗争事业也确实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危害。

新的中共满洲省委成立后，首先召集哈尔滨附近珠河、阿城、宾县、庆城、汤原等县代表会议，直接贯彻中央“北方会议”和省委扩大会议决议。同时又分别派人去奉天、大连、长春、东满、南满磐石等地，传达布置贯彻决议的行动。因而“北方会议”的错误决议对东北各地党的工作和抗日事业的危害具有普遍性，程度也比较严重。

（一）在城市工作和工人运动中，一再号召罢工、罢课、罢市、组织游行示威，飞行集会。每逢革命纪念日，各级党组织不顾客观的与主观的条件，不计后果，照例组织各种形式的斗争。呼（兰）海（伦）铁路沿线各车站和列车上党的工作基础较好，党员的抗日积极性很高，每到各种纪念日，只要党组织布置斗争，一个晚上就能把传单贴到每一车站和列车上，造成“红色恐怖”局面。届时，日伪军警如临大

敌，随时随地检查旅客，肆意迫害，使得人们不敢乘坐这条铁路的火车。如此，非但使党脱离了群众，而且暴露了自己的组织和力量，以致后来该路沿线党的组织悉遭破坏。

吉林市党的与团的组织，在此期间曾有一定的发展。据统计由一九三二年十二月的九名党员与团员，至一九三三年五月即激增至六十名。在吉（林）海（龙）铁路建立了党的支部。中共吉林特支还动员了一些党员、团员和抗日群众到磐石游击队去直接参加对日作战，工作有相当成绩，曾得到杨靖宇的赞赏。但是，他们仍没有摆脱冒险的工作方式，因而在一九三二年五月六日晚，党团员出动散发传单，因有人被捕叛变导致党的组织被破坏，大多数党员与团员被捕，工作从此陷于瘫痪。奉天党的特委组织也一再遭受敌人破坏。一九三二年十月六日，恰是特委召集辽阳、抚顺党组织代表，研究贯彻“北方会议”和省委扩大会议决议时，特委机关遭受重大破坏。最后以致省委无人可派，竟将一早为敌人暗探所熟悉的同志派赴沈阳任特委书记，结果不久即被敌人逮捕。从此满洲省委与南满城市党组织几乎断绝了联系。

哈尔滨电车工人从一九三二年十月至一九三三年五月曾连续罢工四次，其中三次罢工由赤色工会领导。每次都遭到敌伪军警包围并且在最后一次使多年来建立的工会与党、团组织，几被摧残殆尽。中共北满特委还在一九三二年秋，竟指定九人在哈尔滨法大举行工农兵代表会议，企图建立苏维埃政权^①。岂非荒唐。

经过这一时期城市工作和工人运动的大破坏之后，党在

^① 见一九三二年九月二日《中共满洲省委工作报告第一号》。

东北各地城市中，就仅仅只是保留了秘密的组织工作和通讯联络而已。

（二）在农村工作中所犯的冒险主义错误更是比较明显。党和游击队在农村游击根据地普遍号召抗租、抗债、抗捐，抢粮分粮，吃大户，以至没收一切地主土地开展土地革命的运动。各抗日游击区和根据地的地主、富农和富裕农户尽皆逃避一空，加以连年战争，结果农业生产下降，使得抗日游击队的经费和给养发生了困难。

在农村游击根据地普遍号召建立苏维埃政权，“创造新苏区”，更属脱离群众。其中东满较为突出。党的东满特委于一九三二年秋普遍开展秋收斗争的基础上，在纪念广州暴动五周年前后，在延吉、汪清、琿春三县建立起若干苏维埃政权。结果造成了根据地建设工作中的混乱状态。延吉县王隅沟（亦称弯弯沟）是较早于十一月二十日建立区苏维埃政权的，接着汪清县委在嘎呀河、琿春县委在荒沟、烟甸砬子分别建立了区苏维埃。这些农村苏维埃政权建立后，除与南方革命根据地一样，宣布没收一切地主土地平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以外，还有许多村苏维埃企图跳过民族民主革命阶段，实行所谓“共同劳动，共同生活”，搞“集体农庄”。农民用自己生产的粮食到城镇换点布，也严加禁止。有五元钱以上现金统交苏维埃政府管理。结果农村无人从事生产劳动，许多谷物弃之于地无人收获，出现挨饿挨冻现象。这种情况，虽然东满特委在一九三三年一月发现后即行纠正，认为它破坏了苏维埃区域内的经济，紧急宣布：“在自己田上所种的谷物，完全归本人所有”。但影响所及，纠正肃清确属不易。

这种“把民族革命战争与土地革命密切联系与汇合起来创造东满的新游击区域与苏区”的政策，不但使群众抗日运动日益低落，使党脱离了群众，而且也促使东满各地的抗日救国军部队的首领，对共产党、游击队和苏维埃区域“敬而远之”，甚至酿成对立。

当时，在东满由于日伪军疯狂的进攻和封锁，由于苏维埃区实行“赤色戒严”，形成了“赤区”与白区的截然对立，使抗日游击根据地经济状况日益恶化。同时，东满特委在肃清反革命工作中，发生了扩大化的错误，采用逼、供、信手段，杀害了大批干部，使党和游击队以及政权、群众团体遭受莫大的损失。

这种建立苏维埃的工作，在其它地方也曾急于推行。例如，在吉林东部的宁安县，党的组织就曾经宣布建立了几天的苏维埃。汤原县委甚至打算在汤旺河东的荒原上建设苏维埃政权。

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土地革命，创造新苏区的政策，显然是不适合于日本占领下的东北这一殖民地的客观环境的。因而在推行的过程中，势必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当时中共绥宁中心县委就曾向满洲省委表示，认为中央与省委提出在东北农村实行土地革命与组织苏维埃的任务，是过早的，认为它只能是一种宣传口号，群众的认识无法跟上。但是省委却武断地认为：“不是群众落后，而是你们落后”，仍命令绥宁中心县委完成“创造东线的苏维埃与红军”的任务。^①

^① 参见一九三三年一月五日《中共满洲省委给绥宁孙巡视员及绥宁中心县委信》。